

# 简论刘勰的“写真”说

皮朝纲

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南朝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是最早直接提出文学要“写真”<sup>①</sup>的主张的。“写真”说是刘勰的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串《文心雕龙》全书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分析刘勰的“写真”说，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整个文学观。

## (一)

南朝的宋齐时代，文学创作在养尊处优、生活空虚的贵游子弟的提倡之下，日趋浮诡雕饰，不少作家“习华随侈，流遁忘反”<sup>②</sup>。刘勰对这种形式主义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指出，这种“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sup>③</sup>的“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sup>④</sup>的文风，在创作思想上就是“采滥忽真”<sup>⑤</sup>，追求虚华而轻视真实。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要约而写真”<sup>⑥</sup>，即文辞精练而内容真实的创作主张。

刘勰衡量“写真”的标准是什么呢？

在刘勰看来，理想的作品应该具备以下条件：“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sup>⑦</sup>。前四者指作品的内容而言，后二者指作品的形式而言。刘勰也常常根据这些条件来反对他所认为内容诡诞、形式淫滥的作品。

所谓“情深”，就是指作品的情感真实与深切。刘勰主张“为情而造文”<sup>⑧</sup>。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以“述志为本”，只有“志思蓄愤”，才能“吟咏情性”<sup>⑨</sup>，当作家内心充满了激动和愤懑，才通过作品来表达这种感情。作家有了炽热的情思，作品才会充满真挚的感情；作品有了真实的感情，才能具有“情往会悲，文来引泣”<sup>⑩</sup>，“谈欢则笑与笑并，论感则声共泣偕”<sup>⑪</sup>，使读者发生共鸣的感染力量。刘勰对情感真挚的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如说楚辞“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sup>⑫</sup>；说汉代古诗“婉转附物，招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sup>⑬</sup>。他反对那种没有真实的感情而片面追求华美形式的作品。他抨击那些“为文而造情”的作者是“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sup>⑭</sup>，因为他们没有真情实感，于是就只有用浮夸和繁华的辞藻来掩饰和炫耀，以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所谓“事信”，就是指作品所使用的材料、所反映的事实，能经得起生活的检验，真实与可靠。刘勰主张“事以明覈为美”<sup>⑩</sup>。他赞美和肯定那些“事信”的作品，如他肯定司马彪《续汉书》的“详实”和华峤《汉后书》的“准当”，称之为东汉之冠<sup>⑪</sup>；肯定《管子》、《晏子》是“事覈而言练”<sup>⑫</sup>。他激烈反对那种“莫顾实理”<sup>⑬</sup>的过于“诡异之辞”和“譎怪之谈”<sup>⑭</sup>。

所谓“义直”，就是指作品敢于真实反映生活，表达作家正确的观点。刘勰主张“义必明雅”<sup>⑮</sup>，“析理居正”<sup>⑯</sup>。他反对那种“文丽而义睽”，“理粹而辞驳”<sup>⑰</sup>和“诬矫”“回邪”<sup>⑱</sup>的作品。

所谓“风清”，就是指由作品的“情深”、“事信”、“义直”而形成的清新流畅的文风所给予读者的教育作用。刘勰把“情深”同“风清”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招怅述情，必始乎风”，“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深乎风者，述情必显”<sup>⑲</sup>，因此“情深”必“风清”。

“情深”、“事信”、“义直”、“风清”就是刘勰衡量“写真”的标准。在此前提下，他要求作品形式方面做到“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即“贵乎体要”<sup>⑳</sup>，文辞美丽而又不淫侈烦滥，不浮诡芜杂。在刘勰看来，内容与形式二者中应以内容为本，内容是决定形式的。他认为作品“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sup>㉑</sup>。同时，他又主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要求作品做到“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sup>㉒</sup>，就是思想内容真实而语言形式完美。

刘勰关于作品内容要真实的主张，是继承了前人特别是桓谭、王充等进步思想家的论述的。王充十分推崇桓谭，也深受桓谭影响。王充曾提出“疾虚妄”、“归实诚”的主张，反对“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sup>㉓</sup>的风气。他曾说他的“《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sup>㉔</sup>。并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sup>㉕</sup>。因此，“实”几乎成了王充《论衡》的思想核心。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引用桓谭和王充的创作经验来说明进行艺术构思和创作的甘苦和迟速<sup>㉖</sup>，他还直接引用桓谭关于作品应“实覈”“要约”而反对“好浮华”“美众多”的主张<sup>㉗</sup>，来抨击当时“率好诡巧”<sup>㉘</sup>的错误倾向。可见刘勰受他们的影响是深的。自然在桓谭和王充的论述中虽然涉及到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但他们所论列的“真”、“实”，一般地说，还是作为历史上的唯物论者的哲学概念而提出的。他们的影响反映在文学评论家刘勰的议论中，却有着不同的内容。刘勰在同形式主义文风作斗争中，在吸收前人主张的基础上，以更加明确的语言，直接提出了文学要“写真”的主张。

刘勰为什么重视和强调“写真”呢？因为他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他看来，“政化贵文”，“事蹟贵文”，“修身贵文”<sup>㉙</sup>，即是说文学是为政教服务的，是为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服务的。因此，他认为只有内容真实而又形式完美的作品，才能发挥文学的这种社会作用，而那种只追求华美的形式却缺乏真实内容的作品，是“无贵风轨，莫益劝戒”<sup>㉚</sup>，“无益时用”<sup>㉛</sup>的。而且“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sup>㉜</sup>，如果作品只有繁缛的文采而缺乏真实的深刻的思想内容，阅读起来必然令人生厌，是打动不了读者的心弦，收不到良好的效果的。

刘勰重视和强调“写真”，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是针对当时文坛上风靡一时的形式主义文风所提出来的补弊救偏的主张，在文学发展史上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刘勰关于“写真”的标准，是以儒家的经典作为楷模的，他认为圣人制作的六经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sup>⑧</sup>，是完全符合“情深”等六个条件的“情信而辞巧”的典范作品。他反对“采滥忽真”的倾向，指责“为文而造情”的作者“离本弥甚，将遂讹滥”<sup>⑨</sup>，就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的。所谓“本”，就是指儒家的经典，“离本”就是背叛了儒家经典。他主张的“要约写真”，就是要“正末归本”<sup>⑩</sup>，“矫讹翻浅，还宗经诰”<sup>⑪</sup>。这是刘勰在文学思想上表现出来的封建保守观点，表现出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 (二)

刘勰提出“写真”说的依据是什么呢？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作家塑造的艺术形象和作家的激情，都来自现实生活。刘勰注意到了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对作家和文学创作的积极的影响。他用“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sup>⑫</sup>来扼要而深刻地说明作家的感情随着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而作品又是由于感情的激动而产生的。他又明确地指出了文学创作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发生变化，政治隆污，社会治乱，学术思潮，都会对文学发生深刻的影响，文学和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sup>⑬</sup>。刘勰的这些见解，都肯定了文学是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的反映。

刘勰基于他对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的认识，主张文学在反映现实时，应该真实地表现作家深切的感情，真实地描写事物的实际情况，真实地表达作家正确的思想，才能使文学发挥它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拿自然景物来讲，真是千姿百态，妩媚多娇，“云霞雕色，有踰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sup>(44)</sup>，是很美的。刘勰从总结历代作家的创作经验中体会到，文学创作决不是生活的简单的重复和自然的摹写。生活虽美，仍需要作家运用“神思”进行艺术加工，把被描写的生活中的事物集中起来，使生活中的事物在艺术形象中得到突出的表现，从而更美更动人。他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在从生活美到文学美、从生活真实到文学真实的过程中，进行艺术加工的重要性：“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sup>(45)</sup>，“润色取美，譬缁帛之染朱绿”<sup>(46)</sup>，“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sup>(47)</sup>。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刘勰不可能明确认识到并明确指出这种文学美来源于生活美，而文学美又比生活美更理想的辩证关系，但他在有关论述中，是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的。

刘勰还进一步指出，作家在描写和反映现实生活时，不要只追求“形似”<sup>(48)</sup>，即表面上的真实，而应该“善于适要”，<sup>(49)</sup>即善于抓住事物的要点，运用“以少总多”<sup>(50)</sup>的艺

术概括方法，深刻地描写事物的体貌和神情，做到“情貌无遗”<sup>(51)</sup>，从而达到实质上的真实。而且，他还主张，作家在描写事物的实际的、真实的样子时，可以运用想象、夸张等艺术手法，加上一些奇特的、华丽的成分，只要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sup>(52)</sup>，使“奇”“华”与“真”“实”结合起来，就可以使艺术形象更加符合事物的实际和真实。这是我国古代文论中涉及幻想与真实相结合、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相统一的问题的最早的一个例子。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刘勰是不可能认识到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的源泉的。在他看来，圣人的经典就是作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他说，经典是“文章奥府”、“群言之祖”<sup>(53)</sup>，经书“虽旧，余味日新”<sup>(54)</sup>。他给作家指出的创作道路，就是学习儒家经典，就是“宗经”：“若夫镕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sup>(55)</sup>因此，他也不可能明确地提出作家应深入生活并真实地反映生活的科学论断。

### (三)

刘勰认识到，文学要“写真”，作家就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

刘勰认为，要使作品的思想内容真实而深刻，不致“失真”<sup>(56)</sup>，作家就必须“积学以储宝”<sup>(57)</sup>，加强学习，积累知识。因为学识渊博，就可以“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sup>(58)</sup>，从而把握住事物的特点和本质，获得正确的认识。如果“学问肤浅，所见不博”，必“迍邐于事义”<sup>(59)</sup>，作品就会缺乏正确的思想内容。

刘勰强调作家要“博观”<sup>(60)</sup>，就是要广泛的观察、研究、分析，特别要通晓艺术的规律和方法，加强创作实践，才有可能获得“写真”的本领。他用“操千曲而后晓音，观千剑而后识器”<sup>(61)</sup>来生动而确切地说明加强艺术修养和创作实践的重要性。从操千曲到晓音，从观千剑到识器，就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提高的过程。他还用“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sup>(62)</sup>来形象而深刻地说明具有深刻的鉴别力的重要性。不观乔岳之高，就不知培塿之低；不酌沧波之深，就不知畎浍之浅。只有善于从众多的复杂的事物中，进行比较，才能提高自己分析事物的能力；也只有善于从众多的作家作品中加以比较，学习和吸取好的经验，才能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

刘勰是意识到了作家积累生活知识的重要性的。他提出作家要“研阅以穷照”<sup>(63)</sup>，就是要精研自己的生活阅历，以获得对事物的彻底的理解。刘勰在论述一些作家时，讲到了他们的风格特色与他们的生活经历之间的密切关系。如他在论述建安文学的风格慷慨多气时，首先指出其社会根源是“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sup>(64)</sup>；又指出其与作家生活经历的关系，建安时代，“文学蓬转”<sup>(65)</sup>，文学之士生长于动乱之际，经受过流离失所之苦，耳闻目睹社会的残破悲伤，胸中郁积着磊磊不平的慷慨之气，他们“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sup>(66)</sup>，发而为诗，凄恻动人。在论述刘琨的风格“雅壮而多风”、卢湛的风格“情发而理昭”时，指出他们“亦遇之于时也”<sup>(67)</sup>。在论述屈原时，指出“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sup>(68)</sup>就是说屈原

